

唐凯麟 / 主编

中华民族 道德生活史

高恒天 / 著

秦汉
卷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唐凯麟 / 主编

中华民族 道德生活史

秦汉卷

高恒天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秦汉卷/唐凯麟主编;高恒天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4. 6
ISBN 978-7-5473-0670-3

I. ①中… II. ①唐… ②高… III. ①伦理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1656 号

丛书策划: 梁 惠

责任编辑: 鲁培康

技术编辑: 徐儒静

装帧设计: 一步设计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秦汉卷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407 千字

印 张: 26.5 插页 2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670-3

定 价: 65.00 元(精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52069798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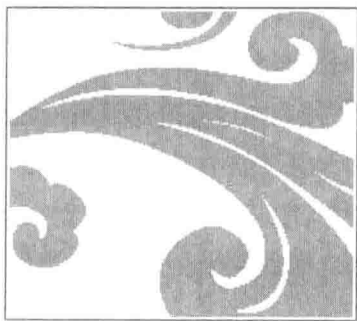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秦汉时期道德生活的发展状况	/ 1
第一节	秦汉道德生活的社会基础	/ 2
第二节	秦汉主流道德价值的探索与建立	/ 19
第三节	秦汉道德生活概况	/ 28
第四节	秦汉道德生活的变动格局	/ 38
第二章	秦汉道德关系的构成与类型	/ 49
第一节	秦汉道德关系的一般构成	/ 50
第二节	秦汉道德关系的种类	/ 57
第三节	秦汉诸重要道德关系	/ 62
第三章	道德追求彰显的道德生活画面	/ 79
第一节	无为适己的道家道德追求	/ 80
第二节	非攻节用的墨家道德追求	/ 82
第三节	宽厚乐善的长者道德追求	/ 88
第四节	重富尚贵的逐利道德追求	/ 93
第五节	尊君强国的大一统道德追求	/ 99
第六节	富民化民的德政道德追求	/ 122
第七节	复古求新的制度伦理探求	/ 128
第八节	宣孝扬忠的家国道德追求	/ 135
第九节	击“浊”扬“清”的“清流”道德追求	/ 143
第四章	大一统背景下的道德教化	/ 153
第一节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代举国教化	/ 154
第二节	以经为典的汉代道德教化新格局	/ 159
第三节	尊师、敬老、卑女的汉代社会道德教育	/ 162
第四节	官民互化的政治道德教化	/ 175
第五章	秦汉时期婚姻家庭道德生活	/ 179
第一节	婚姻道德	/ 180
第二节	秦汉家庭、家族道德规范	/ 189
第三节	家族道德之法律、政治、经济之维	/ 200



第四节	秦汉家庭间道德生活	/	212
第六章	秦汉政治风云中的道德生活	/	219
第一节	秦汉之际政治道德选择与冲突	/	220
第二节	两汉之际政治道德选择与冲突	/	230
第三节	东汉后期政治道德选择与冲突	/	249
第七章	秦汉时期的职业道德生活	/	263
第一节	军事生活与军人道德	/	264
第二节	外交事务与使节道德	/	270
第三节	医德与科技道德	/	279
第四节	官爵变动道德与官员为政道德	/	286
第八章	秦汉时期的公共道德生活	/	303
第一节	敬长尊贤与克己利人	/	304
第二节	清议、歌舞与道德舆论	/	309
第三节	妇女开放与女性道德权利	/	314
第四节	复仇雪恨与忠孝友悌	/	318
第五节	厚葬、薄葬与优风化俗	/	323
第六节	岁时节令与敦风化俗	/	326
第九章	秦汉时代之民族道德生活	/	333
第一节	匈奴道德生活	/	335
第二节	西域诸民族道德生活	/	346
第三节	东北诸民族道德生活	/	356
第四节	百越诸族的道德生活	/	369
第五节	巴郡、南郡、武陵诸郡蛮和西南夷之道德生活	/	376
第六节	羌族道德生活	/	386
本卷结语 / 397			
参考文献 / 399			
索引 / 403			
后记 / 419			

第一章

秦汉时期道德生活的发展状况



第一节 秦汉道德生活的社会基础

秦汉时期,始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郡县制帝国,终于公元 220 年魏王曹丕用禅让制的形式以魏代汉,共 441 年。虽然其间也出现过数次短暂的混乱和分裂,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一统是主流。

这一时期,不但在民族、疆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当时道德生活提供了特有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决定了当时道德生活的风貌和格局。这主要表现在:集权政治就是尊卑有序的道德秩序和敬上慢下的主奴人格的社会基础;大一统和多民族以及宗法制的家国同构社会现实不但为当时官方所倡导的主流道德生活提供了扩张的空间,而且也为当时的孝道、尊君、忠君等道德生活提供了更多资源;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各有特色的区域经济以及门类众多的产业格局不但为道德生活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而且也为时人崇尚奢侈提供了经济方面的社会基础;人口数量的增减和迁移,不但直接影响到道德生活的规模,而且也影响到道德生活的交流和质量,甚至影响到道德生活的完整性。天灾人祸所引起的人口数量的突然减少,必然意味着“三纲六纪”等道德关系的完整存在受到破坏;“五服”框架中的民族关系对于官方倡导的主流道德生活向少数民族地区的扩张也提供了平台;无权者阶层、特权者阶层以及有人身权、财产权但无特权者阶层的阶层格局及其相互转化也为反暴政等政治道德生活提供了基础。

一、政治基础

就秦汉帝国的政治特点来看,它是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政治,也是大一统、家天下的极权政治。这从当时的历史以及政治制度方面可以看出。

1. 家天下之帝制

秦帝国,自公元前 220 年秦始皇称帝起,到公元前 207 年冬秦王子婴“奉天

子婴符”投降刘邦为止,共传三代,即秦始皇、秦二世、秦王子婴,帝国持续仅14年。

秦帝国灭亡后,从公元前207年到公元前202年,原来推翻秦帝国的反秦势力分裂为若干割据势力,其中以刘邦和项羽分别领导的两支割据力量最为强大。其他割据力量或者依附于刘邦,或者依附于项羽,结果,在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中,汉王刘邦的力量最终消灭了西楚霸王项羽的力量,于公元前202年在“汜水之阳”称帝,从而建立了西汉帝国。公元8年,外戚王莽通过禅让制的形式使新朝代替西汉,从而以“天命”和法律的形式宣告了西汉的终结。

西汉帝国共持续210年,历经12位皇帝,其中在文帝前有吕后执政7年时间,他们依次分别是:汉高祖刘邦、惠帝刘盈、高后吕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奭、成帝刘骘、哀帝刘欣、平帝刘衍、孺子刘婴。

从西汉灭亡到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的17年间,先后出现过新莽、更始等中央或地方政权,社会陷入剧烈的动荡、混乱和分裂之中。

从东汉建立到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于公元220年以禅让的形式退位为止,东汉共持续195年,共有14位皇帝在位,他们依次是: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炆、和帝刘肇、殇帝刘隆、安帝刘祜、幼帝刘懿、顺帝刘保、冲帝刘炳、质帝刘缢、桓帝刘志、灵帝刘宏、少帝刘辩、献帝刘协。从公元189年董卓废少帝刘辩而立献帝刘协起,东汉就日益进入分裂的局面,中央政府就名存实亡。此后,诸侯混战,最终以魏、蜀、吴三国鼎立而结束了东汉名义上的存在。秦汉帝国这种同姓帝王前赴后继的历史充分显示了家天下的政治制度特点。

2. 大一统的集权统治

秦汉时期,政治上最有特色的就是统治的疆域空前辽阔,政治权力日益由地方向中央集中并越来越集中到皇帝个人手中,虽然在这400余年的时间中,最高权力几易其手,但这种政治特色并没有实质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战国六雄故地的大业,自称为始皇帝。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北伐匈奴、东击辽东、南降百越、西南臣服生活于云贵高原以及川西高原的众少数民族而积极开拓疆土,从而使秦帝国的疆土覆盖了“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

记·秦始皇本纪》)的广袤区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大一统帝国。

在如此空前广大的帝国,要使政令畅通、下情上达和便于赋税交纳,秦帝国实行了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措施:一是设立郡县制;二是构建了以皇帝为顶点的从中央到基层的金字塔形官僚体系;三是广修驰道、栈道、运河等交通设施以加强中心地与边缘的联系;四是在战国时旧长城的基础上,修筑新的长城;五是实施了焚书坑儒为其极端措施的思想专制和严刑峻法国策。这些措施最根本的政治意义就在于集权。

在建设和巩固帝国的过程中,大量的劳役和赋税以及巨大的行政成本使秦帝国很快成为民众之敌,秦二世时,终于激起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六国旧贵族和农民军的共同打击下,秦帝国很快为刘邦建立的西汉帝国所代替。

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除了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外,还更多地继承了秦帝国的政治制度。这主要表现为以减轻农民负担的方式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以削弱王国权力的方式加强中央集权,以削弱相权的方式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力。经过高后、文帝、景帝三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刘彻时,西汉帝国进入其鼎盛期,此时的西汉帝国,不但恢复了秦帝国在边疆的故土,而且还极大地超越了秦时的故土,西域以及东北的广大地区也首次纳入帝国的版图,于是,丝绸之路得以开通,帝国内的民族数量空前增加,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汉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空前增加。

在加强专制皇权方面,采取了设立内朝以及从根本上削弱诸侯国的推恩令等措施。在经济上设立了政府专营的工商企业。在用人制度上正式实行察举、征辟制度。在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和文化在帝国内的独尊地位。通过诸多方面的创新,使这多民族、大一统、家天下的帝国得到进一步巩固。大约从西汉元帝时起,西汉的统治日益衰退下去,帝国外患虽然不突出,但内忧却日益加深,这为王莽代汉创造了条件。王莽上台后,试图通过全面的社会制度改革来摆脱社会危机,但因其食古不化,而且朝令夕改反而加深了既有的社会矛盾,从而使新莽政权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中为民众起义所灭亡。

在推翻新莽的数支农民武装力量中,刘秀所领导的力量脱颖而出,在消灭各地割据力量后,重建并恢复了汉帝国的统治,这就是东汉帝国。与西汉帝国相比,东汉的皇权更加集中,皇帝不但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且极大地削弱了三公的权力,除此之外,还通过“图讖”使皇权神圣化。东汉和帝以后,这种空前集中的皇权反而为外戚和宦官交替利用,受儒家教化的士大夫日益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政治的日益黑暗和腐败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特别是公元184年暴发的黄巾大起义,虽然没有灭亡东汉帝国,但却使东汉帝国中央政府失去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使其皇帝沦为军阀的傀儡,为曹魏终结东汉帝国奠定了基础。

二、经济基础

1. 所有制格局

秦汉时代的经济格局主要体现为土地所有制的双轨制、区域经济以及产业门类的多样性诸方面。首先,当时的经济基础格局,主要表现为国有与私有并存的“双轨”土地所有制格局。虽然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与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在先秦时期就已并存,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普遍程度和巩固程度并不能与秦汉时代相比。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运用国家强制力“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徐广曰),从而极大地推广并巩固了土地私有制。两汉时期,这种私人土地所有制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

整个秦汉时期,在所有制方面,始终存在着国有土地所有制与私人土地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就秦汉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具体情况来看,主要指的是秦汉帝国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并支配土地,将之用于封赏功臣、对平民授田和进行屯田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国有土地本身就存在着向私有土地转化的可能。

就当时的私有土地情况来看,主要有三种形态。第一是皇室的私有土地。虽然早在先秦就存在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所有制观念,但在秦汉政府的实际操作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时的帝国政府存在着两套财政渠道,一是主管政府机构财政的大内渠道,一是为皇室提供“私奉养”的少内或少府渠道。而后者正是皇室土地所有权行使的代理机构,除此之外,有时候,皇帝还从民间置

办私田,这也是皇室土地所有制的表现形式之一。

第二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私人大土地所有制或者通过军功而受封赏,或者通过皇帝的赏赐,或者通过土地交易,或者通过巧取豪夺,或者通过继承等方式而形成。

第三是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这种小土地所有制是整个秦汉帝国实行专制的大一统统治的真正基础,正是自耕农为秦汉帝国提供了财政源泉和劳务支出,自耕农数量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安危。但问题在于,自耕农尽管数量大,但他们分散在帝国的各个角落,一盘散沙,他们经受不起来自大土地所有者以及高利贷者的兼并,也经不起帝国政府苛赋杂税的盘剥,更经不起其他方面的天灾人祸。这注定了自耕农在一定的条件下或者转化为秦汉帝国的官奴婢,或者转化为豪强者的私奴婢,或者转化为反抗现有社会秩序的起义者,或者转化为背井离乡的流民,或者挣扎在死亡线上自生自灭,总之,对自耕农小土地的剥夺是帝国崩溃的最深刻原因。

2. 经济地理格局

除了所有制格局以外,秦汉时的经济格局还表现在地理方面,这就是秦汉时期的经济地理格局。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着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区,只不过由于各国各自为政,使得各经济区之间的联系松散,交往不便,但在秦汉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改观,先秦时就存在的各分散经济区得以与中心经济区紧密结合,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到秦汉中期,全国已经形成四大经济区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已有所概括:“夫山西饶材、竹、穀、𦍋、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菜、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司马迁在此所明言的四个经济区分别是山西经济区、山东经济区、江南经济区、龙门碣石以北经济区。

山西经济区,在当时是指太行山以西的广大区域,这一区域以关中为龙头,由关中、巴蜀以及广大的西北地区构成。关中有先秦时期,就是当时最为发达的经济区,在秦始皇统一各地后,这一地区又与广大的西南西北地区联为一体,从而成为当时秦汉帝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隙陇蜀之

货物而多贾……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僂,僂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关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后来,王莽末年的战乱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创,但这一地区的关中以外的偏远区域则因为成为难民的避难之地而使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开发。

山东经济区,指的是当时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指黄河下游两岸的平原。这一地区在先秦时期就是与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区域,是秦汉帝国最重要的粮仓。秦始皇时,曾大量征调这一地区的谷物以供军需。西汉中央政府每年也“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汉书·食货志》)。但这一地区的经济在东汉末年因为战乱和自然灾害而遭受了空前的灾难。

江南经济区,包括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即司马迁所说的“楚越之地”。这一地区由于在先秦时就开发不足,再加上气候在当时比不上黄河流域,所以,在秦汉时代,这一地区仍然是“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的经济落后之地。

龙门、碣石以北的广大区域半农半牧,虽然农业比不上山东和山西两个经济区的水平,但畜牧业却是当时的发达之地。

3. 产业格局

秦汉时代的经济格局还表现在产业格局方面。就当时的产业门类来看,主要有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

农业是当时国民经济的最重要门类,与先秦时代相比,这一经济门类中的生产力有了很大进步。就生产工具看,虽然铁制农具在先秦时已经出现,但并没有秦汉时期普及和完善。这一时期在农业技术方面的显著进步表现在汉武帝时的搜粟都尉赵过倡导代田法和区田法,取得了“用力少而得谷多”(《汉书·食货志上》)的成果。除了在农业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之外,在当时大一统的政治条件下,由官府组织民力提供的公共农田水利设施也得到大规模兴建和恢复。同样,在大一统的政治条件下,秦汉帝国内外的农业种植对象也得到了

空前的交流和丰富,一些南方和西域的瓜果蔬菜也在此一时期传入内地。汉武帝时从西域引入内地的黄瓜、大蒜、苜蓿、石榴、葡萄、胡桃、胡椒等传入中原地区后,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生活。此一时期,园艺业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压条、嫁接、套种、复种等新技术得到应用,甚至出现了温室栽培技术。西汉时,“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然蕴火,待温气乃生”(《汉书》卷八十九《召信臣传》)。

秦汉时,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除了农户家中饲养传统的马、牛、羊、鸡、犬、豕六畜外,还有人成群地牧养猪、羊等。汉武帝时的卜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汉书》卷五十八《卜式传》)以及公孙宏“家贫,牧豕海上”(《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宏传》)就是著名例证。由于耕战的需要,当时的养马和养牛业得到了特别的发展。汉武帝时甚至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书·食货志》)的盛况。除了汉民族聚居区存在畜牧养殖业以外,当时最主要的畜牧业存在于长城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区,在这一广大地区生活着匈奴、鲜卑、乌桓和乌孙以及西羌等游牧民族。与这些游牧民族相邻近的边郡地区,还存在着政府的官营苑厰以及私人的牲畜养殖场,史籍中的记载对之也有所反映:“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盐铁论·西域篇》)。

手工业是秦汉时代的另一重要产业门类,当时存在着两种经营形式,一种是政府掌握经营权的国有官营手工业,一种是由私人掌握经营权的个体手工业。当时的手工业门类主要有铁、纺织、盐、器物等制造门类,东汉时,蔡伦又推动了造纸业的发展。

在秦汉大一统的格局下,商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像手工业的经营方式一样,当时也存在着官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就秦汉历史来看,除了西汉前期一度“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盐铁论·错币篇》)外,其他时期,盐、铁等重要物资基本上为官营,汉武帝时,金、银、铜、丹砂及酒一度也为官营。就民营商业来看,其经营的品种或门类更多,除了日常所需的粮食、肉类、果菜、布、皮、器物、车、马、葬具等以外,还经营奢侈品,这与权贵们过着“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纈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玕;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丛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的奢侈生活密切相关。

就当时这些产业门类中的利润率情况来看,司马迁明确地认为:“夫用贫求

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利润率在这些产业门类之间的不平衡,必然引起经商者众的后果。《汉书·食货志》对此也有所揭示:“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商业的繁荣必然使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得以兴起和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西汉时的长安“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闾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平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后汉书·班彪列传上》)。此外,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江陵、寿春、合肥、睢阳等地都成为著名的经济中心。

4. 人口格局

人口因素,无疑是道德生活存在的最重要基础之一,要再现秦汉时代的道德生活,必须对当时的人口因素有所了解。这一时期的人口因素主要表现为数量随自然或社会环境状态的优劣而增或减,人口在空间中的分配和流动不但与天灾或人祸密切相关,而且还与统治者的人口政策密切相关。

就人口的数量增减来看,由于时间久远,要详尽地了解当时的情况,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可以做到的只是利用史籍中记载的数据进行相对的分析。根据时间的先后,现分别就秦代、西汉、东汉的情况分别罗列如下。

影响秦帝国人口数量变化的因素主要是帝国内发生的战争和繁重的赋税、徭役等因素,根据已有的史料,可以断定,影响此一时间内人口数量变动最大的因素是战争。在秦帝国从兴盛到灭亡的数十年中,三个时段的战争便使人口也相应地发生过三次显著的下降。第一时段的战争是秦帝国建立前后兼并六国的战争,据学者推断,战国时,七国人口曾达到或接近3 000万,但到秦统一六国时,全国人口总数已降至2 000万,在数十年时间内,人口发生如此显著的下降,与秦人的“上首功”政策密切相关,根据这一政策,谁在战争中拥有的敌方人头数量越多,谁的战功就越高,在这种政策下,死亡人数多是不难想象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动的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扩张的战争无疑对于人口

数量的增减具有二重性,它在消耗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的同时,又因为扩张而增加了秦帝国直接统治的人数。由于此方面的史料缺乏,因此而增加的帝国人口数量无法说明。

秦始皇时,除了发动这些战争外,还修筑大量公共工程以及秦始皇陵园,全国为此而长期服役的人数就有 200 多万,占当时统计人口的 10%^①,高强度的劳役不但抑制了人口出生率,而且增加了人口死亡率。从这个意义上看,秦的暴政无疑也是影响当时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秦末农民战争以及随后的楚汉相争,无疑又加速了人口数量的大幅下降,项羽就曾一次性坑杀所俘虏的秦国战斗人员 20 余万,因战争而死亡的平民更是难以数计。到刘邦称汉王时,全国人口已降至 1 500 万,其后数年,楚汉相争所产生的人口下降数字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情况无疑也是相当严重的。

秦国的人口政策对人口的增减影响不大,见之于史籍的政策是“案比”。它要求地方官员每年定时对其辖区内的民众进行户口验查登记,这种活动当时被称为“案户比民”,简称“案比”。

就西汉人口数量的变化来看,导致人口下降的因素主要是天灾人祸。与天灾相比,人祸的影响更为显著,当时人祸的表现是战争、暴政、社会动乱等;而人口上升的因素则是和平有序的社会环境。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此一时期数量有升有降。

汉武帝发动对匈奴战争之前,由于政府曾颁布实施“民产子,复勿事二岁”的鼓励人口生育政策,甚至还实现早婚以及“妇女怀孕由官府给胎养谷,对于孤儿及生而家贫不能养育者,由官府廩给”^②的政策。这些政策无疑极大地促进了人口数量的增加。结果,到汉武帝时,人口数量达到了西汉的第一个高峰。

公元前 133 年后,汉武帝由于长期对外用兵,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结果,形成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的人口下降局面。

从公元前 89 年汉武帝下轮台之诏,“悔征伐之事”(《汉书·食货志》)到西汉平帝时,西汉人口数量达到了其历史最高峰,“百姓资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

① 曹文柱:《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0 页。

② 同上书,第 72 页。

户口最盛矣”(《汉书·食货志》)。此一时期人口之所以能够平稳上升,与相对安定有序的社会和平状态密切相关。

王莽代汉后,由于不但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社会矛盾,反而激起了空前的反暴政运动,于是,人口在自相残杀中大量消耗,“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汉书·食货志》)。王莽死后,所形成的诸侯割据局面以及长期的兼并战争,又使大量人口被消耗,结果,到了东汉初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才十二三”(《续汉书·郡国志五》,刘昭注引应劭《汉官》),造成了一场空前的人口急剧下降局面。

随着东汉社会秩序的日益恢复,到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东汉的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当时的人口数量达到5320余万,已恢复到西汉末年的高峰水平。其后,东汉一直到东汉灵帝时黄巾大起义前,人口的增长停滞不前,“始终徘徊在900万户,4000余万口上下”^①。

东汉末年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以及随后的诸侯混战,又造成了空前的人口下降,据官方统计,三国时期著籍户口总数约有1466423户,人口7672881人,与东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相比,户数与人口数下降均约为86%^②。虽然有学者对此数据有异议,但是,人口大幅下降是东汉末年的不争事实。这样,综观东汉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发现,其变化曲线为独驼峰型。

秦汉时期,人口在各地的分布密度差异很大。就秦及西汉时的总体情况而言,华北平原以及黄淮平原、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南阳盆地的人口密度最大,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100人左右。特别是关中地区,由于是政治中心,再加上秦汉帝国政府都曾向此地大量移民,使关中平原中心地带的人口密度甚至达到每平方公里1000人。而长江以南的大多数地区人口密度最低,北方以及河西走廊、东北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也很低,但或稍高于南方。^③

东汉时,人口分布在各地的密度与西汉时有很大不同,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关中平原和西北地区的人口数量较西汉时期显著减少,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今河南南部及长江流域的湖南、江西及东南地区,人口比西汉有较大增长,

① 曹文柱:《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② 同上书,第63页。

③ 同上书,第66页。

长江以南的某些地区人口呈数倍增长。”^①

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迁移和死亡。其中人口的迁移或者出于政府的强制或吸引,或者出于自然灾害,或者出于战争与动乱等。而人口的死亡无非是天灾或人祸。就东汉而言,由于首都定于洛阳,吸引了大量移动人口,又由于战争,不少流民移入较少战争之地。北方一些流民进入西南的蜀地,东南的吴会和西北的凉州等就属于这种情形。

三、思想文化

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不但以气势恢宏而傲视世界,而且因其既具统一性,又存在着多样化而著称于世。这既得益于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也得益于空前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更得益于当时劳动者和思想界精英们的勤奋和努力。现将此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分类依次澄明如下。

1. 形上思想文化

如果把形上理解为超越人的感性、超越人的经验的话,那么在秦汉时代,其形上思想文化主要表现为此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文化与宗教迷信之间,由于相互渗透而具有密切联系。如“天”就是它们互相渗透而形成的典型概念,这一概念继承自先秦,人们以之作为判断和理解世界的依据,并把它视作为人类思想和行为的终极合理性源泉。

就当时的哲学思想文化而言,秦帝国时期,主要表现为对由先秦邹衍提出的具有宗教色彩的五德终始理论的信仰和践行,这种理论本质上也是一种神秘的天人关系理论。就当时的宗教思想文化而言,主要表现为对于类似后来道教思想的长生不死成仙思想的信仰和践行。而在人死后,又存在着视死如生的丧葬习俗,在此两方面,秦始皇都曾是坚定的身体力行者。秦帝国灭亡后,这两方面的形上思想文化虽然存在着变异,但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秦始皇在意识形态领域崇尚法家,而法家在形上的人性论方面又认为人性本恶,于是,人性本恶的人性论也应被看作是秦帝国时期存在的重要哲学思想文化。

^① 曹文柱:《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8页。